

三民主義透視美國對華政策(上)

曾 虛 白

一、前言

民國六十七年歲尾美國總統卡特勾結匪僑與我絕交，予我國國際地位以嚴重的震撼。我們知道，卡特斷然作此絕情之舉，並無任何特殊理由，祇是繼承尼克森「談判代替對抗」，反映美國人民懼戰心理所生之後遺病耳。面對俄帝侵略，美國妄想以談判方式化干戈為玉帛之餘，更希望利用匪俄矛盾以伸張其爭取和平之聲勢。延伸而至其與我與匪僑關係，則美國以匪不犯我換取其與匪建交，同時希望以我不反攻大陸換取其與我非官方之聯繫。簡言之，美國策略，以和平方式連絡兩個中國作其對俄談判的資本。

匪僑竟迎合美國要求作決策的。他們竟會隨聲附和，高唱和平。以鬥爭起家，藉鬥爭以繼續維持其存在的中國共產黨，竟會熱誠表示願與我中華民國政府所在地臺灣通郵、通航、通商為和平共處統一中國開先路。我政府洞囑其詐，斷然斥其奸謀而堅拒之。

我與匪僑對美政策的一拒一迎，造成兩者國際形勢發展盛逆之鉅大差距。國際政治是一隻趨炎附勢的熔爐，匪僑得美國的支持，奪我聯合國常務理事國地位之後，在國際間扶搖直上，聲勢顯赫，而我則退處隱僻，幸得朝野團結，自力更生，仍處不敗之地。然我艱苦奮鬥之餘，若干仗義友人與愛國志士，義憤填膺，同聲作不平之鳴。美與匪僑皆能背棄道義原則，捐除是非標準，拉往日的敵人作摯友，視過去的盟友如路人，中華民國又何必膠柱鼓瑟堅守反共原則而不化呢？本人主持的文化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班有一位韓國同學在兩年前做的博士論文，就以「中華民國與中共的對外關係」為題，廣集資料，旁徵博引，確證國際學術界的確充滿着這種憤慨之情。連年我政府召開的國家建設研討會中的返國學人亦多坦

誠建議要求政府修改國策。近據報載，今年國建會中又有陳林、張世賢、郭仁孚與吳亮等幾位與會人士大談所謂「彈性外交」問題。說什麼「由於價值觀念多元化，國際間已沒有所謂唯一的正義或真理可言，如果我們還是用唯一的、不兩立的標準來衡量國際友邦的作法，很可能到處碰壁！外交的方法與手段，要有變化，對外關係的理想主義色彩不能太濃厚，要以彈性的現實主義指導外交政策。」（註一）

這些憤激之士主張我們也應該步美國後塵，放棄原則，面對現實，是正確的考慮呢？還是感情衝動時不平衡的心理變態？實是謀國者亟應研究的問題。這個問題，拆穿了講，實導源於我們最需要合作的盟友與我們的政策觀念有了南轅北轍的距離。要使兩個意見不同的朋友恢復舊交，迎合潮流，勉強遷就，不是辦法，而唯一有效辦法，祇有以誠摯的心情作坦白的檢討。我們以為，以主觀認知之交流，彼此坦白檢討，嚴肅糾正，以求確切把握到客觀真理的實質，藉以解除誤會，重建兩國携手合作的基礎，才是中美兩國愛自由愛民主的熱心人士都應該努力的工作。筆者不才，願先就我三民主義立國思想角度透視美國對華政策以作投桃之獻，願美國學者亦能以美國立國精神作報李之酬。我們雙方應該承認立論主觀色彩之不能避免，同時我們也應彼此允諾，有儘量容納對方批評指責的雅量。

容許筆者先從簡述美國對華政策的發展經過入手。

二、溯 往

我們檢討中美關係之發展經過，無法遠溯，祇能就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迄今短短半個世紀來作抽樣示範的檢討。半個世紀五十年，時間不能算長，可是我兩國關係，由合而離，離而復合，往復翻騰，竟有六次之多。

第一次歐戰發生，美國遠隔重洋，初無參戰之意，後因環境所迫，不得不勉強加入。可是，美國的參戰使原來的歐洲局部戰變質而成民主國家翼護共同安全的世界戰，而美國參戰舉足輕重，轉敗為勝，更使美國意外地黃袍加身變成了領導民主集團的世界盟主。

這盟主的地位，雖因受國內厭戰心理的壓迫美國不參加威爾遜一手創造的國際聯盟，表面上受了挫折，實際當時戰後的國際形勢仍惟美國的馬首是瞻。在美國領導之下，先與英、法、意、日訂五強海軍公約，限制海軍噸位；次與英、日、法訂四強海軍公約，尊重太平洋島嶼領土權利。特別爲了尊重我中華民國主權與領土完整與確保我門戶開放，美國專約英、法、意、日、荷蘭、比利時、葡萄牙與我中華民國訂定九國公約。最後，它更約集了英、法、意、日、德、俄都在內的十五個國家在巴黎簽訂了一份非戰公約，確保簽約國決以和平方式解決一切糾紛。那時候，美國的威望如日方中，中國人的心目中，望之儼然是一位患難中可以發生起死回生作用的有力盟友。

說患難，患難就來了。在一九二八年非戰公約簽訂的第二年，一九二九年蘇俄以爭奪我中東鐵路的管理權爲理由，出兵攻我邊境，佔領我城市。美國務卿史汀生根據公約與俄談判，俄態度強硬，美綴羽而退，不復作任何表示。剛訂的非戰公約經不起第一次測驗而報了廢！隔了兩年，民國二十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美國國務卿史汀生主張應根據九國公約發動對日經濟制裁，胡佛總統修正之，軟化爲「史汀生的不承認主義」。所謂「不承認」實指「不承認日本侵略的一切後果。」其效果祇止於「不承認」，並無任何政治行爲以支持此「不承認」。此後就構成國際聯盟派調查團調查我國東北，發現了日製傀儡滿洲國，國際聯盟不承認有這國家，日本拂袖退出國聯，美國勢力也從此被屏於遠東之外，而九國公約也從此成了一團廢紙了！

這是戰後美國勢力在遠東由興轉替的轉變，影響與我關係也當然是由合轉離的變化了。實際，吾國在此時期備受日閥凌辱國難最殷之時，不幸，美國國策之重心卻在避戰，假使戰而不可避，美寧助歐不助亞。故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本發動蘆溝橋事變之日，羅斯福立刻宣布美國應作「防

疫隔離」(Quarantine)準備，嚴防受戰爭氣息的污染。因此，日本侵略美國以口頭抗議爲限度，而九國公約亦祇限於作形式上的制裁了。

美國國策的定型每隨其環境的變化而轉移。當它面對日德東西兩個侵略者這樣氣焰高張仍屏息消沉一無感應的時候，忽然來了日本軍閥突襲珍珠港，予其海空軍力以空前毀滅性的打擊之後，它像睡夢中醒覺過來般，立取積極參戰的步驟。它對日對德先後宣戰後，立即動員全國軍民同時參加東西兩個戰場。在亞洲戰場上，經過六七年單獨抗日閥侵略的中華民國當然變成了美國最有力的作戰伙伴了。於是我軍事委員會的蔣委員長立刻被推爲亞洲聯軍中國戰區的總司令，並以領導世界四強之一領袖的身份參加開羅會議。中華民國受日閥侵略，六七年來未得任何外援，孤軍奮鬥，萬里行軍，輾轉抵抗，其本身所受的損傷，實罄竹難書，即其打擊日軍，迭奏奇功，銷磨日閥戰鬥實力，對擴展成世界大戰的盟軍，實爲一筆鉅大貢獻！

然而，這些過去貢獻，在美國現實主義者的估計中不佔怎樣重要份量。美國參戰助我動機，現實估計，祇有兩個目的：第一個目的，維持中國繼續作戰，使其牽制日本，以待美國先在歐洲擊敗德國之後再來亞洲擊敗日本(註二)。第二個目的，協助中國建立成一大國，俾戰後能與西方三大盟國美、英、蘇俄取得平等地位，以爲戰後國際組織建立遠東穩定基礎，鞏固美國領導地位。(註三)

爲了要達成這兩個目的，美國勢必要加強它干預中國內政的興趣。這未嘗不是善意的動機，不幸給不肖僚屬歪曲運作，竟造成不可挽救的錯失。美總統派任爲亞洲聯軍中國戰區蔣總司令部下做參謀長的史迪威就憑這一點動機，無視主管，不受指揮，進而被共黨利用，種下中美兩國政府韓戰爆發以前無法補救的裂痕！

史迪威原爲我軍閥時期美派駐華的一個粗魯武官，素抱輕視中國官僚之成見，此次來華任要職復增其掌握美援之優越感，故對蔣委員長早置其僚屬之身份於腦後而頤指氣使，繼因美國左傾職業外交家戴維斯(John D. Davice)之介，先後集謝偉志(John S. Service)、盧登(Raymond P. Ludoen)、艾默森(Johnson K. Emerson)等左傾職業外

交家羣於其左右，在官職掩護下作協助中共擴軍的工作。此後史迪威雖經蔣委員長堅決要求而去職，然其培養之左傾勢力仍盤踞國務院，影響此後美國對華政策直到韓戰之爆發。赫爾利在史迪威調職後受任為駐華大使，處理公務，動輒受人牽制，曾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我曾請撤換那些反對美國對華戰區政策的職業官員，但許多職業外交官回到華盛頓都被置於國務院中，成爲我的上司，而其他一些人則成爲亞洲最高指揮官的顧問。在此種情形之下，他們大多數依舊繼續支持武裝中共，並有時藉帝國主義者來阻得我們美國的政策。」（註四）赫爾利的這套牢騷充份暴露了這些左傾職業外交家滲透活動的無微不至。

這些左傾職業外交官是抗戰時期有組織散佈在美國政府中傷害中國政府最狠毒的敵人。他們干涉中國內政的基本陰謀，誣中國國民黨爲貪污無能之政黨，捧中國共產黨爲農業改革之新進政治集團，助其取代國民黨主持中國政府，爲美國協助中國應取之步驟。故其設計分成四個步驟（註五）：第一步，要求中國國民黨政府不得歧視中共部隊；第二步，建立美軍與中共部隊的聯繫，裨得以美國軍用物資支援中共助其擴軍；第三步，促成中國之聯合政府，俾中共在政府中佔得地位；第四步，完全承認中共所組織之中國政府。（註六）

他們這套設計是針對美國政府現實主義的要求定下型來的，換言之，美國政府之與我中國祇視我利用價值的高低以定其對我交誼之厚薄。這些左傾親共的職業外交家，說服美國政府使它相信，祇有中共參加或中共主持的中國政府才對美國有利用價值可言。於是美國政府透過馬歇爾的執持迫我政府接受不可能接受的屈辱條件而赤化了大陸！

在馬歇爾迫我斷送大陸以前，美國以同樣現實主義心理的反映，伙同英國，一九四五年在雅爾達以中國爲犧牲品來交換蘇俄的對日參戰。那時歐洲戰場開始全面反攻，德軍陷於三面作戰的險境，使蘇俄在歐無後顧之憂，而在太平洋與日本未絕國交，蘇俄反得舉足輕重之優勢。當時日閥侵略勢力實已陷絕境，急求停戰以自救，史達林於赴雅爾達會議之前已得日方求和之暗示。英相邱吉爾早視共黨控制之蘇俄爲戰後和平之隱患，則誘導蘇俄戰後發展由歐轉亞集中注意到中國來，可讓英倫在歐、印度在亞

皆得喘息機會，爲英國戰後復興之上策。美總統羅斯福則以美軍對日作戰已改變戰略，主要戰場由中國大陸轉入太平洋，美軍已克復所羅門羣島，登陸馬紹爾羣島，改取越島進攻的戰略，節節勝利。中國戰場，在這改變戰略的估計中既已失掉了它過去可以利用的價值而要求蘇俄參戰，以減少美國最後襲擊的犧牲，卻變成了羅斯福現實主義的主要考慮了。史達林知日無戰意欲坐收亞洲勝利果實之侵略陰謀，加上了邱吉爾轉移蘇俄侵略箭頭的自私心理，再配合上羅斯福烏盡弓藏的現實打算，於是三巨頭於一九四四年在德黑蘭初度會商，一九四五年在雅爾達最後密商協定，以蘇俄恢復其侵佔中國東北之權益，交換其對日宣戰。結果，日本在蘇俄對日宣戰三天後就投降了，蘇俄就根據雅爾達協定變成了不戰而佔領我東北的勝利軍，得藉此機緣培養中共叛軍，建立其顛覆我政府的實力。（註七）

中共叛軍得在中國大陸逞其篡奪政權的叛國陰謀，坦白檢討，馬歇爾的和平調解實予匪以莫大的助力。日軍投降後，吾政府受美國參加的國際協定之橫加壓力，使中共叛軍坐大而成與我政府並肩對等的政治勢力。美國即支持此叛逆而插身爲此兩大平等勢力中間之矛盾調停人，企圖促成二者合作之聯合政府。我們即就這一程序的邏輯理解來作客觀的衡量，美國對我中國唯一合法政府態度之不合法、不合理已無解釋可尋了！

當赫爾利受左傾職業外交集團控制，憤而辭去駐華大使職務時，杜魯門總統因自己對外交事務一竅不通，而中國問題又是重要關鍵問題，則駐華大使必選衆望所歸之重要人物責以便宜行事的全權。這個人，他就選中了爲歐洲戰後復興聖誕老人的馬歇爾上將。杜魯門可沒有想到，馬歇爾憑其「馬歇爾計劃」扶助戰後國家，不論敵友，一個個都從瓦礫堆裏站起來，祇對中國，竟控制援助不予，斷送了這並肩作戰盟友的前途！

然而，馬歇爾本人的動機還是純潔的，他誠心誠意要扶助中國從戰後瓦礫堆裏站起來，也跟扶助其他國家一樣的熱心。可是如何扶助的看法與因而產生的方法，他受人蒙蔽，被人利用，發生了與其本意背道而馳的歪曲。據確實記載，馬歇爾在來華之前自己，也感到對中國問題是門外漢，希望政府推薦專家予以協助。於是，杜魯門就指定國務院的遠東專家代他擬定一套「美國對華政策大綱」交給他參照實施。這套大綱雖有馬歇爾自

己以及國務卿艾奇遜參加，實際全由國務院遠東司主管范宣德 John Vincent 一人主稿。范宣德是美國當時左傾集團大本營「太平洋學會」(IPR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Pacific Relations)的理事，且身任國務院要職，就成爲該學會影響美國政策的主力。其所擬對華政策大綱之內容摘要如下：

(一) 美國贊成中共組織中國聯合政府達成下列目的！

(甲) 擾亂國民黨後選政於民召開國民大會的號召，要求國民黨將政權交給聯合政府；

(乙) 轉移三民主義的號召，代之以新民主主義；

(丙) 爭取中國國內第三勢力，作爲實踐過去中共向中央投誠之諾言及將來顛覆中央政府之準備。

(二) 中國中央政府主張中共應先放下武器才可加入政府。美國主張應先讓他們加入政府才放下武器。

上述第一項還是藏之於心的腹案，第二項卻是必須要見諸行動的調解條件了。馬歇爾之奔走徒勞一無結果以此，國共談判必然失敗的原因也以此。這是任何常識判斷都會知道其行不通的，爲何范宣德還要作這擬議呢？這就反映了當時那些左傾職業外交官對華政策的內層心態：一貫期待新進有爲的中國共產黨來取代貪污無能的中國國民黨掌握政權。那麼，馬歇爾的奔走調停，在那些左傾職業外交官心目中，祇是徒勞無功的虛應故事耳！

據史學家梁敬錚的分析，馬歇爾使華負擔的使命是扶助中國成爲一個「強大而統一的民主國家」，不辛奔走調停一年餘，繳羽而歸，一無所成，其失敗原因不外兩端：(一)他主張美國軍隊不參與中國內戰，(二)他主張美國援助物資不用於中國內戰。這兩點，說得冠冕堂皇，的確是一個中間調解人應取的態度。可是，就中美關係歷史過程研究，這是美國對華態度一個大轉變的表示。因爲美國政府取此態度即表示，美國已認定中國政府削減叛亂的軍事行動已轉變爲中國國內平等勢力奪權的內戰行動。因此，美國就自加限制，凡是過去它以中國政府爲盟國政府的軍經援助；此後皆應視作助長中國內戰的援助，使中國內戰火上加油日形擴大，不是美國應做的事情了。因此，中國政府要繼續取得美援，必先停止內戰。換言之，美國以中

國政府停止內戰爲其繼續給予美援的條件，共匪當然就會不停止內戰來切斷中國政府美援的來源，於是與匪和談，談談打打，打打談談，受匪玩弄，難求結束。美方不以此責匪，反以無意言和責中國政府。於是加強壓力，迫我就範，杜魯門總統竟通令美國與中國有關的八個機構，停止一切與中國財經援助的談判與活動，以助馬歇爾的調停任務達成。實際當時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心態，經左傾職業外交家的積極醞釀，棄我助匪，建立中國新政權的認識已經在馬歇爾心版上定了型了！(註八)

美國在戰後儘量阻塞援華之路以削弱我政府之實力，蘇俄戰後卻在努力增援匪軍以助其奪取政權。一九六五年九月二日莫斯科電臺華語廣播中坦白承認：「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蘇俄的支持下獲得了鞏固的後方，必要的軍事武器和應有的裝備，因此能以新生的力量，展開了擊潰蔣××軍隊的戰役。」

實際，匪軍實力的展開，蘇俄的助力雖大，馬歇爾的幫忙，才真正使他們死裏逃生，復活了他們的新生力量。我指的是民國三十七年四平山之役，馬歇爾迫我蔣委員長下「第二次停戰令」的無理脅迫行爲。那時候，蘇俄培植匪軍已告成功，蘇軍撤出東北後，匪軍乘勢猖獗，到處橫行。中央政府部隊陸續運到東北，雖數量較弱，然士氣旺盛，觀此逆勢成氣憤填膺，決予痛懲，因而大舉進攻。匪軍迎戰於四平山，激戰數日，匪不敵，潰退如山崩，倘予窮追，必可殲滅餘逆，斬絕其發展之根。時馬歇爾正返美述職，聞此突變急飛回南京，要求蔣委員長立即下令前線停止進攻。蔣公拒絕其請，馬歇爾竟以退出調解處爲要挾。蔣公無奈，勉納其請，下了所謂「第二次停戰令」。蔣公在其「蘇俄在中國」中憤慨地寫道：「第二次停戰的結果就是政府在東北最後失敗的關鍵……故卅七年冬季國軍最後在東北之失敗其種因全在於第二次停戰令所招致的後果。」匪軍得此復活的機會，才能繼續在東北坐大，擴大其窺奪地盤，卒至強佔了整個大陸，凡此意外收穫實受馬歇爾之厚賜！在此，個人願把馬歇爾如何繼續影響美援對我之縮減，再作簡略檢討。

馬歇爾調停中國和談失敗，回到美國反昇任了國務卿，於是他那套削減援華觀念更定下型來。他以爲中國政府前途黑暗，援助它既無補於事，

且給予援助一方面鼓勵中國內戰，一方面又刺激蘇聯，皆為不智，故此後美國應儘量削減對華援助。然美國朝野仍多主張加緊援華者，特別國會方面，反對馬歇爾對華政策甚力，范宣德卒不稱其職而外調。後馬歇爾因欲國會通過其援歐的馬歇爾法案，雙方妥協，通過了一九四八年的援華方案。即此方案，國務院仍主張不列軍援，通過後執行時國務院又予以事務上不合作之種種阻礙。那時候我政府在大陸大勢已去，美國軍援已不能生任何救急功效了！

最後，我要提一小撮資料來顯示戰後我得美援之衰，竟比不上美國援助大戰時之敵國。美國戰後援助日本共計十七億兩千萬美元；德國，共計三十億八千九百萬美元；意大利二十億四千六百萬美元。而我中國戰後復興所得的美援祇有十五億九千六百萬美元（註九）。怪不得美國中國問題專家顧貝克（Anthony Kubek）要說：「中國不幸事件的主要關鍵人物也許要算是馬歇爾將軍了！」這是一針見血的至理名言，我們該永誌不忘！（註一〇）

中國大陸就這樣在美國不露痕跡的協助下給共匪竊據了去。在中國政權這樣轉變的關頭，美國政府竟會無視與我政府尚存的國交，令其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不隨我政府遷駐廣州，仍留守南京以待匪方偽政權青睞之早盼。可惜出乎華盛頓意料之外的，毛匪澤東竟在民國三十八年底訪問莫斯科，四十年春與史達林發表聯合公報簽訂協定表示了崇拜俄帝一面倒的姿態。這不啻以暗示方式把司徒雷登一脚踢出了南京城。難怪這位給共匪洗過腦退休後天良重現的美國外交官，在他的回憶錄，「在中國五十年」裏最後寫道：

「我們多數美國人祇看到中國共產黨好的一面，沒有注意到他們不容異己，頑固偏執，欺詐勒索，草菅人命和其他極權政制的一貫罪惡。我們祇知照着共產黨的意思去了解，例如前進，民主，自由，布爾喬亞，反動，帝國主義這些字眼的意義，我們未能正真正完全了解中國民主運動最近新的成就以及它可能成就的動向。中國今日的災禍，不光是中國大陸的災禍，也是美國和整個自由世界共同的最大災禍。我們對這災禍的產生不能逃避一部份的責任。」（註一一）

盤踞在美國國務院裏的那些左傾外交官集團棄我助匪建立中國新政權的陰謀，因匪的向蘇一面倒而全盤失敗，爲了要洗清過去他們膽大妄爲的責任起見，他們設計，即由國務院出面於民國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發表美國對華政策的白皮書，詳述美國調解中國和談之經過並表示了中國事此後應由中國自理，美國政府不再插手過問的洗手政策（Handsoft Policy）。但表面上這樣說了，白皮書的字裏行間，仍在暗示中共倘能以狄托姿態投美，仍所歡迎。

美國政府沒有想到這份美國洗手不管中國事的書面公告竟闖了大禍。美國祇想到要洗清自己在中國大陸干政的責任，竟沒有顧到這是打開大門投下鼓勵蘇俄侵略亞洲的一顆香餌。美國表示不問中國事就無異表示美國勢力退出了北太平洋。滿懷飛機侵略的史達林，眼看整片中國大陸已劃入他的奴疆，韓國、日本都是戰後無國防可言的國家，那麼，美國勢力退出了北太平洋，史達林用任何方式都可以不費多少武力，傳檄而定把韓國、日本劃進他的奴隸領域裏去。美國白皮書的發表不是鼓勵蘇俄飛機侵略的一個有力提示是什麼呢？！

史達林不傻，當然會掌握這個機會，於是毛澤東就當了他衝鋒陷陣的犧牲品而發動了震撼世界的侵韓戰爭。

史達林的發動韓戰是出乎杜魯門的意料，可是杜魯門應付韓戰之堅決敏捷也出乎史達林的意料。杜魯門竟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方式，發動聯合國組成的聯軍，堂堂皇皇開到韓國戰場上跟蘇俄支援的共匪侵略部隊正式作戰起來。這一手，把史達林唾手可征服日韓的迷夢一棒打醒了，同時也把洗手不管亞洲事的美國又捲進了戰爭漩渦裏面來了。

韓戰的爆發把業已消沉到跡近斷交的中美關係推入離而復合的第五個階段，這是客觀的形勢逼成的。因爲，美國想訂新交的中共已給蘇俄趕上韓國戰場變成了美國的敵人。那麼，一貫執持剿滅這叛逆的中國中央政府自然又應恢復他的利用價值了。可是，利用雖利用，仍有它的限度。論理，美國拿着聯合國聯軍的大纛，到韓國戰場去懲膺侵略，侵略者復以中共當衝鋒的前哨，那麼，要求身爲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中華民國派遣精兵參加討伐，不獨理所當然，並且可以倍增聯軍精神制敵的聲威。那時候聯軍

統帥美將麥克阿塞向其總統杜魯門作這建議，竟遭嚴拒。理由很簡單，中國政府利用價值尚須加以限制，不願逼中共走上掉不轉頭來的絕路。及後聯軍仁川登陸，迫擊侵略者，節節勝利，麥克阿塞正擬揮軍渡鴨綠江，直搗敵軍基地，杜魯門復加制止，其對中共容忍之態度更昭然若揭。實際上，韓戰爆發後美國派遣第七艦隊巡邏臺灣海峽，負的是雙重任務，一方面是協防臺灣不受中共攻擊，另一方面亦阻止臺灣反攻大陸。因為杜魯門還是要保持他對夾海兩岸的中立政策。

可惜杜魯門的這些秋波得不到中共的反應，民國四十二年韓戰停火協定簽訂之後，中共竟轉其侵略箭頭，攻我臺灣。中共的猖狂逼着美國不得不與我簽訂中美共同防禦的軍事條約。這份條約的對我有利部份，取得美方接受共同反共的合作行動。該約第二條規定訂約目的是要「維持及發展其個別及集體之能力，以抵抗武裝攻擊，及由國外指揮之危害其領土完整與政治安定之共產顛覆活動。」換言之「按這個條約精神和內容，美國當時非但對協防臺灣願負責任，而且對於共產主義在臺灣之滲透也是反對的」(註一二)。至這份條約對我不利部份，則規定中國除「行使固有自衛權利之緊急行動」，對臺灣以外採取軍事行動，須受獲得美國同意的限制。換言之，我要反攻大陸必先徵得美方同意(註一三)。這又是杜魯門中立臺灣海峽政策的再度表現了。

實際上，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並不排除美國與中共和平解決國際糾紛的可能性。因為，美國國會通過了中美協防條約的所謂「臺灣決議案」，聯合國在三天之後又即由美國支持提出了「臺灣停火案」希望以承認兩個中國的原則來解決臺灣海峽危機，充份表現了美國對華雙管齊下的妥協態度。

美國這項提案雖因我與匪方皆不支持而放棄，美國仍不死心，仍以美不反對統一中國惟需以和平方式完成之的角度，求中共之接受。不料民國四十七年赫魯雪夫訪華與毛匪發表共同公報，斥美為侵略國，要求開國際高階層會議，拉匪參加以提高其國際地位。赫氏離平之後，毛匪不再考慮美國的低姿態，立即集大軍於金馬對岸，積極作攻臺的整備。

美國爲了實踐條約的義務，勢必派遣第七艦隊到臺灣海峽來擔負協防

任務。至其協防任務範圍之確定，美國政府發表聲明時，其措辭決策者有軟硬不同兩派之爭。國務卿杜勒斯主張強硬，使中共知難而退，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主張彈性，「讓中共去猜」。總統艾森豪接受了後者。據他後來在回憶錄裏說明當時作這決定的理由說：「在此情形之下發表全力支持蔣總統的聲明，可能鼓勵中華民國對大陸發動攻擊；若我聲明對蔣總統不作任何支持的表示，雖對蔣總統不利卻解除了敵人的惶急。」(註一四)最後擬定辦法，在杜勒斯答復參院外交委員會質詢的信函中以含糊、暗示的方式作讓中共去猜的表示。

因此，美國第七艦隊的巡邏臺灣海峽祇限於防衛，不作軍事介入，故其空軍活動的打擊目標祇限於中共在臺灣的船隻與中共近海的機場，儘量避免深入中國內地當作一場懲罰性的作戰行動。因此，領海寬度與中共有了爭執，中共主張，臺海中，美艦護航領海寬度應爲十二海里；美方不理，並聲明敵方如攻擊美必反擊。然美方仍保持接受三海哩的原則，護航艦停在中華民國金馬領土範圍外之公海中，始終未引起任何衝突。

臺海炮戰中，美匪日內瓦大使級談判仍在配合進行，迫我放棄金馬的壓力與日俱增。壓力的主要來源，來自三方面：第一來自盟邦，英國首相麥米倫主張可劃金馬爲中立緩衝地帶，不駐軍；第二、第三來自美國政府內部，參謀首長們以我拒撤金馬，目的在引發美匪直接衝突使美國助我反攻，故主張金馬不應駐兵，祇需保留若干哨兵；國會參院外交委員會即以爲「臺灣決議案」既已授權總統可以隨時保護金馬，自無常駐軍隊之必要(註一五)。當時談判進行，重點仍在雙方撤走駐在金馬的軍隊，使金馬中立化這個問題上求結論。匪方代表王炳南最後表示，如中華民國肯撤走金馬駐軍，他將建議匪偽政權立即停火，並建議匪方，除保持臺灣應有的主權外，承認臺灣政治現狀並放棄以武力侵犯臺灣的任何企圖。美方認此爲合理之讓步，要求故總統蔣公予以考慮。蔣公以「寧爲玉碎，毋爲瓦全」之表示斷然堅拒之。美方無奈，祇得放棄其迫我撤離金馬的想法。今日我們事後追思，假定那時我政府不勝美方壓力接受了這個建議，則今日中美斷交，廢止了兩國共同防禦條約，我們沒有了金馬將何以維護我海防與空防的安全，又將何以保持我對外貿易，海運這條生命線的暢通無阻

，則我臺灣祇能準備挨打永無還擊的力量了。故總統 蔣公睿智一時的聖斷，垂澤迄今，安得不益增我們的懷念！

中美共同防禦的條約雖經簽訂了，可是一個問題始終是你說你的，我說我的，實際未成協議，永遠含糊過關。這問題就是涵蓋上述金馬撤防問題的我反攻大陸問題。因為，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訂立的動機，中美雙方就有不同的解釋：中國方面置重點於反共的認同，強調此約是美國願與中國並肩反共之表示，可是美國方面祇置重點於防衛，表示所約祇限於美國願努力確保臺灣安全之表示。前述該約對我有利與不利內容的對比，實即我對此約看法不同的比較。這歧見延伸而成行動，就變成了美國應否支持我反攻中美間永遠擺不平的爭執了。

這爭執初暴露於民國四十七年十月美國務卿杜勒斯訪華與我政府發表聯合聲明的措辭中第六節的一句話：「中華民國政府認為恢復大陸人民之自由乃其神聖使命……而達成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徑，為實行 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而非憑藉武力。」美方以為爲末了這句話，就是中國政府放棄武力反攻的表示。我駐美大使葉公超招待記者立加澄清，說道：「中美聯合公報的意義是強調政治基礎在光復大陸工作中的重要性，而非強調不用武力……沒有一個國家保有軍隊，而又放棄武力的。」接着我副總統兼行政院院長陳誠也發表談話表示，我仍有權對中共使用武力以協助大陸人民革命。美國國務院爲澄清各方面誤解起見，特由發言人懷德發表聲明，強加解釋，以爲中國政府既決定以和平方法恢復大陸人民的自由，那麼，倘然在大陸上爲了自衛，爲了發動大規模的起義，當然還不妨使用武力的。這真是各說各話無結論可尋了。

實際美國政府這樣模稜兩可的態度反映了他們心底裏要承認兩個中國並肩存在的腹案。這腹案由所謂「康隆報告」全盤揭露了開來。康隆學社是一個美國民間的學術團體受美國參院外交委員會的委託做「美國外交政策」的研究報告。報告有關中國部份，它竟主張美拉匪入聯合國代我爲常務理事國外並主張把中華民國改爲「臺灣共和國」，與匪偽政權並存而成兩個國家。在這同時，總統候選人甘迺迪的外交顧問鮑爾茲（Chester Bowles）也在主張一個怪誕分裂中國的辦法，他主張美國應承認匪偽政

權，勸我放棄金馬，另建一個「中臺國」（Sino-Formosa Nation）。足見兩個中國在那時已成美國政治界的一時風尚了。

因此甘迺迪登臺就一意推行兩個中國的政策。他公開向敵對的國家伸出和平的手，特別對中共用試探漸進的方式改善關係。他要求陸續派二三十名記者赴大陸被匪拒斥後，躊躇滿志，無所作為。適在此時，共匪鎮壓革命失效擬以「大鳴大放」挽回人心，大陸各階層全面抗暴怒潮正在醞釀之中；益以民國五十年大陸災情遍及全國，饑寒難民如洪水般向邊境洶湧。因此，故總統 蔣公一再聲明，反攻大陸拯救同胞已到了成熟時期。甘迺迪總統怕我們有行動，竟提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規定，謂我方未得美方同意之前，不得對大陸發動任何軍事行動。同時，我們的副總統陳誠也在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大會中針對美方表示，憤慨發言說：「中共的敗象已無可挽救，我們決不因國際局勢的任何變化而動搖拯救大陸同胞的決心，更不因任何國家或個人自私短視的做法而放棄反共抗俄的國策。」（註一六）可是甘迺迪一直到他遇刺被害的最後一天，始終沒有放開他阻我反攻的手。

甘迺迪之阻我反攻，並非他對共匪有何厚愛的成見，而是他對匪估計因環境之變遷而有異於前人。論戰略，他的前任艾森豪採取杜勒斯的建議對中共實施圍堵政策，甘迺迪也蕭規曹隨，繼續圍堵。但，甘迺迪對中共的圍堵與艾森豪的圍堵戰略目標卻顯有不同。艾森豪同意杜勒斯的看法，認定中共這個不得人望的政權祇是過眼雲烟（Passing Phase）圍而堵之，它會「胎死腹中」的；甘迺迪卻不然，他把中共看做欣欣向榮的一個政權，圍而堵之，希望它能接受美國的條件變成美國促進世界和平的伙伴。因爲戰略目標有這樣的不同，他當然要儘量阻止我們的反攻了。

我們檢討美國對華政策的下一步驟已輪到簡述尼克森發動的棄我納匪之美國對華政策的第六次大轉變，這大轉變是受他「談判代替對抗」政策的影響，而這政策的形成卻是越戰促成的結果。因此，我們的檢討應從研究越戰開始。

美國的參加越戰也像它參加韓戰一樣是絕對被動的。越南原來是法國的殖民地，二次大戰之後，法國想重返中南半島，再掌越南的霸權，胡志

明得中共的支援抵抗之。美國以實施它圍堵共產勢力之圍堵政策，助法培擊胡志明領導的越盟。一九五四年法軍與越盟戰於越南的奠邊府，法軍大敗，法國代表才趕到日內瓦來要求約越盟求和。那時候在日內瓦開會的英、法、俄與中共的代表是為了解決韓戰問題來的。後因韓戰問題找不到結論而越南問題轉成嚴重，才改開解決中南半島問題的會；除英、德、俄與中共代表已在場外，另又續邀了越南、寮國、柬埔寨等代表參加。美國杜勒斯不重視這會議，祇派他的副國務卿史密斯率團參加。日內瓦協定簽定後七月廿二日，艾森豪總統才發表聲明說明美國的態度道：美國非交戰國，中南半島問題的協議主要責任繫於交戰國。美國的任務是儘量給予合作，並協助法、東、寮及越南獲取一個公正及光榮的協定。後來日內瓦會議簽訂了解決中南半島問題的協定，其所生效果為：

(一) 共黨控制下的越南民主共和國獲得國際承認。

(二) 法國在東南亞的勢力宣告結束。

(三) 中共在東南亞的影響力增強與滲透東南亞的機會增加。

(四) 越南共和國有形無形中獲得保證並維持其獨立與自主。

美國與越南共和國拒簽此約。美國拒簽的理由有四：(一) 這次簽約，法國不惜作重大犧牲以求和，美深感不平；(二) 英國因不願見越戰繼續，竟妥協接受和談，美亦不滿；(三) 俄共中共訂有軍事同盟參加簽字，顯有作用；(四) 法已失敗，除美介入越戰外，無法挽救大局，美尚未具介入決心。

根據上述考慮，美國政府雖不簽字，卻發表聲明表示，如發現任何一方違反上述所簽協定而認為情勢嚴重並可能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定時，美國絕不坐視。

實際美國的參加韓戰與越戰，艾森豪在他一九五三年就總統職位典禮演說中已說明了美國的動機。他以為，韓戰與越戰都是反共鬥爭的一部份，因此他說：「吾人所擁有的信心不但屬於吾人全體，且屬於全世界的自由人民……它將一種共同的尊嚴帶給犧牲在越南的法國士兵、在馬來亞的英國士兵、在韓國的美國士兵。」當然他說這話時，法國還在奠邊府作戰。後來到了一九五四年一月十日。艾森豪又授權杜勒斯發表的「大舉報復戰略」(The Strategy of Massive Retaliation) 為美國嚇阻俄共中共

直接介入中南半島糾紛的藍圖。艾森豪自己又在一九五四年一月的一次文件中表示：「失去東南亞任何一個國家，最後將導致失去整個東南亞，然後失去印度和日本，最終將危及亞洲的安定與安全。」(註一七) 這一套就是當時盛傳的所謂「骨牌理論」(Domino Theory)(註一八)，坦白說明了美國參加韓戰跟着必須參加越戰的理由，是為赤禍侵略形勢所逼，純屬被動而無任何主動政策可言。

為了防止東南亞的赤化，美國在無法控制的發展中，逐步增加了自己保衛越南共和國獨立自主的責任。就公開的國際關係方面講，美國並沒有作任何援越的承諾，當然沒有派兵介入越戰的責任或義務。可是，自甘迺迪繼艾森豪為總統之後，西貢的美國軍事顧問人數繼續增高，而美國的特種部隊更在越南前線活動頻繁，美國熱心助越，甚至涉及越南暗殺其領袖吳廷琰的政變。美國派入越南的軍隊人數到一九六三年已達一萬二千七百三十三人的高峯(註一九)。詹森繼任總統後，東京灣事變，北越魚雷攻擊美國驅逐艦構成北越與美國海軍的衝突，而百里居事件更是北越向美軍營地的直接挑戰。這種形勢的發展，促使美軍在越，越陷越深，幾乎挑起了全部作戰的任務。

美國介入越戰，從一九五四年日內瓦協定簽訂日開始到一九六八年越共向美軍發動大規模的所謂泰特(Tet)攻勢，已經把美國拖在越南戰場上整整十四個年頭了。美國最後集結在越南戰場上的兵力竟擴大到四十四個戰鬥營，武裝人數增加到五十四萬八千五百人(註二〇)的高峯。因此，引發美國國內人民激烈反對越戰的運動。多數知識份子發動利用電視討論美國參加越戰的不當，強迫大專學生停課聽此宣傳的所謂「強教運動」(Teach-in Movement)。若干過激份子更在大街上集眾撕掉徵兵卡，以示堅決反戰。這種運動，一時全國響應，成為不可遏止的政潮，迫使詹森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卅一日廣播聲言，他已下令海空軍停止對北越的攻擊，並向北越提出迅速談和的要求，同時表示本人不再競選總統。這就給尼克森打開了他「以談判代替對抗」美國政策新路的大門了。

在莫斯科美國貨品展覽會中，面對赫魯雪夫痛斥共產主義的美國著名反共鬥士尼克森竟會接過詹森遞過來的棒，向北越共產黨懇求停戰，該算

是人類文明的一大諷刺。然而尼克森卻有一套自圓其說的理由。他以為今日世界已經由共產世界與反共世界兩種勢力兩元對峙的局勢，轉變而成許多不同的勢力，各憑自力特具的功能競秀爭雄的多元世界。因此，就沒有理由要求美國來負擔維護越南獨立自主的責任，美國可以名正言順地把軍隊撤出越南。但，爲了表示美國對越戰始終負責起見，尼克森規定在美軍撤走以前，美國對越南必須完成三個條件：(一)在巴黎和談中爭取到確保越南安全的保證；(二)壓制北越不再發動新攻擊；(三)訓練越南軍隊到能夠完全接替美國部隊的作戰能力。這就是尼克森所謂的「越戰越南化」，也就是他自己規定美軍撤走必須完成的任務(註二一)。

於是結束越戰的協定於一九七三年一月廿七日在巴黎簽定了。這協定規定越戰在國際監督下停火，所謂國際監督是由加拿大、匈牙利、印尼、波蘭四國組成的委員會任之。它劃定非軍事區，監督雙方的實行停火。北越方面承諾，釋放美國俘虜，從寮國及高棉撤退軍隊，並不利用兩國境內基地侵蝕南越；美國方面承諾美國及盟軍軍事人員撤走南越，根據傳統政策將參與中南半島的戰後重建。雙方同意，南越的政治前途由南越人民自決，尊重寮國及高棉的獨立，主權統一，領土完整及中立(註二二)。

這份協定簽訂後，除美國俘虜如期釋放，美軍如期全部撤走外，北越所有承諾皆未實踐。到了一九七五年中南半島形勢迅速惡化，四月十七日高棉政府向其共黨叛軍投降，不到兩星期後，四月卅日越南總統楊文明廣播宣佈越南政府向越共投降。這是尼克森把美軍光榮撤走的後果，整個中南半島赤化了。他事前規定的美國撤軍三條件究竟履行了那一條，祇有歷史家去給他清算的了！

「以談判代替對抗」雖是尼克森讓美軍撤離越南的藉口，卻也變成了美國重訂它外交政策的理論根據，其得失利害容於後文中詳述之。我現在祇歸結到我們討論的重點，那就是，尼克森此一外交政策的重訂，給中共乘虛而入，使美國棄我納匪作第六次對華政策的大轉變。

尼克森掙扎脫離越南戰場之時正是俄毛關係日趨惡化之日，這是美匪關係轉變的關鍵，試作簡要之分析：

一九六八年蘇俄率東德、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五國聯軍摧毀捷克

自由化運動而帶起蘇俄的所謂布里茲涅夫主義，揚言「社會主義大家庭中蘇聯是家主，有權干預其他共產國家的內政。」中共不服，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的人民日報上痛斥蘇俄是社會主義的帝國主義。同時又由毛澤東、周恩來、林彪三匪連名電阿爾巴尼亞共黨第一書記霍查，支持阿共退出華沙公約。電文中聲言：「一個反對美帝蘇修的歷史新時期已經開始。」(註二三)這是史達林死後，毛匪不甘雌伏自大狂的公開表現。蘇俄除在中國邊境集結大軍不斷威脅外，更在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在烏蘇里江內的珍寶島上發動其部隊與匪軍在邊界上作武裝衝突，跟着要求中共就邊界衝突發展改善關係之談判，中共不理。蘇俄又出動飛機坦克侵入新疆裕民縣縱深兩公里，打死中共軍人多人(註二四)。中共受此刺激，即由其駐波蘭代表向美駐波大使建議，開始美匪會談，此後繼續一百三十餘次之多。(註二五)

尼克森就掌握這個機會去說服中共。他在他的回憶錄裏坦白說道：「中共倘不改變，世界無和平可言。因此，我的目標，盡我能力影響所及去影響它的改變。」

他的外交政策所遵循的是絕對的現實主義。他在一九七三年五月三日向國會提出的報告中就說明了這一點。他說道：

「在一九六九年一月，美國需要改變它外交政策的哲理與實施。不論是誰在四年前接任總統，都會面臨這種挑戰，經過了一個時代，戰後的世界已經改變，而且要求一種新的途徑。」(註二六)

尼克森就根據這套構想進行他拉攏中共的外交部署，先找法國戴高樂，繼尋巴基斯坦總統雅亞，後又拉上了羅馬尼亞總統希奧塞古，促成了季辛吉給他鋪路，最後自己訪匪發表「上海公報」的驚人傑作。

他這一手突破中美關係的幾個重點可撮要概述如下：

- 一、放棄了與中華民國反共聯盟的結合；
- 二、確認中共偽政權是一個可以作防禦俄共侵略的武裝伙伴；
- 三、犧牲了美國半世紀來領導自由世界的地位；
- 四、增加了蘇俄劍及履及擴張軍備的緊張；
- 五、雖解除了日韓受中共威脅的恐懼仍未能確保其安全；

六、沒有解除東南亞國家受中共支持共黨顛覆活動的誠懼。
這是尼克森發動了美國對華外交第六次大轉變形成的殘局，雖已經過福特、卡特到今日的雷根三任總統，仍未改變僵化的本質，那末我們溯述美國對華政策的發展經過當到此為止。接着讓我們來進行我們的檢討。

註釋

- 註一：本節見七十年七月份中國時報國內政情欄「今年國建會的政治建言」。
- 註二：見Henry Stimson, H. L. Stimson and M. Bundy: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 (New York: Harpue Bratws, 1950)
- 註三：見「赫爾利的回憶錄」。
- 註四：見「赫爾利的回憶錄」。
- 註五：這是筆者研究白皮書有關資料之綜合筆錄。
- 註六：見顧貝克 (Anthony Kubek) 「遠東是怎樣失去的」(How the Far East was Lost)。
- 註七：本節簡述雅爾達經過是綜合中國研究中心出版社發行郭榮趙著「從珍珠港到雅爾達中美戰的合作之悲劇」內容寫成的。
- 註八：見梁敬鐸著「美國對華白皮書之經緯與反應」。
- 註九：見Anthony Kubek 著「遠東怎樣失去的」。
- 註一〇：同右。
- 註一一：見司徒雷登著「在中國五十年」。
- 註一二：葉公超，「關於中美防禦條約的幾點」載於民國六十七年三月四日中國時報週刊。
- 註一三：見杜勒斯與葉公超交換照會與美參議院對約文的解釋。
- 註一四：見艾森豪著 "Waging Peace"。
- 註一五：同右。
- 註一六：中央社五十六年一月十日稿。
- 註一七：見美國國防部越戰報告書 "the Pentagon Paper" 續集第三二六—三二七頁。

註一八：所謂骨牌理論即指世界局勢，一國被侵略，必波及鄰國相繼受禍，如一排骨牌，一只倒其他亦跟着倒了。

註一九：見美國國防部越戰報告書續集第二七頁。

註二〇：見中國時報六十四年五月二日第二版。

註二一：見David Landaw, op. cit. p. 204.

註二二：見John Norton Noor's *Law and The Indo-China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註二三：見「人民日報」，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第一版。

註二四：見「匪俄邊界談判與毛共伴狂作態」專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號。

註二五：見幼獅月刊發行，尹慶耀著「談判時代話談判」。

註二六：Richard M. Nixon, *U.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70's. A Report to the Congress*, May 3, 1973. p. 2.

實踐三民主義
光復大陸國土
復興民族文化
堅守民主陣容